

# 苏兆征在八七会议前后

(广东) 禩倩红

1926年10月间，北伐军攻占了湖北武汉。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政治军事的重心渐渐从广东向北转移，湖北武汉地区成为新的全国革命中心。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至武汉办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分别从国内各地相继前往武汉工作。为适应国内形势的发展，更好地推动全国工人运动，1927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正式决定从广州北迁武汉办公。3月底，苏兆征交代了广东方面的工作，离开广州，北上武汉工作。



苏兆征

在武汉期间，苏兆征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战斗之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至武汉办公后，制定了全国工人阶级当前主要的斗争纲领：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反对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一切倾向；实行民主，反对个人专政及军事独裁；拥护国民政府继续北伐，彻底完成国民革命；拥护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要求政府颁布劳动保护法；要求改善工人经济待遇；要求组织工会及罢工的完全自由，等等。在苏兆征等领导人的努力下，推动了包括武汉地区在内的全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在实际工作中，他与其他领导人一道，十分关怀和重视解决广大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组织工人群众进行反帝政治斗争。4月初，日本侵略者在武汉制造了屠杀中国工人的“四三惨案”。武汉人民在苏兆征、刘少奇等人带领下，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日领事答应撤退日水兵、拆除防御工事、偿还工人工资等条件。

6月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苏兆征始终参与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大会致开幕词，深刻地阐述大会召开的意义，号召全国工人群众紧密团结，保障我们的革命，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要反对蒋介石屠杀民众，要帮助农民打倒封

建势力”。大会认为“工人阶级当前在政治上最大的责任是：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及一切革命人士，向反革命的中心英勇进攻”。大会庄严宣称：“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将斗争坚持到底！”四次“劳大”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苏兆征再次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继续带领全国工人阶级迎接新的革命斗争。

苏兆征积极领导国内工人运动的同时，密切关注国际职工运动的发展。1927年5月间，有中国、苏联、日本、爪哇、朝鲜和美国等国工会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于汉口举行。中国工会代表团以苏兆征为首。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身份主持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阐述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经过及斗争近况；同时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会议决定在我国上海成立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苏兆征被选为秘书处负责人。苏兆征为组织好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以及积极推动国际职工运动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精力，让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此期间，苏兆征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担任劳工部长职务。这是国共合作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他通过劳工部的建立及活动，运用手中的权力，着力维护广大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职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为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苏兆征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劳动法》，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付诸实行。苏兆征以劳工部长身份，定期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政治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坚持原则，态度鲜明地提出有关问题，极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反对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他一再严正披露国民政府中某些人肆意破坏国共合作的局面，以及庇护一些不法外国商人肆意迫害中国劳工等事实，要求予以惩处。

苏兆征为革命事业而忘我奋斗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而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以及在工作斗争中所表现的卓越领导才能和崇高革命品质，在广大工人群众和共产党员中赢得了热切拥戴，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苏兆征等82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前苏兆征被邀请参加了筹备工作。“五大”正式开幕时，成立了由苏兆征等15人组成的主席团。为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大会进行期间，设立了政治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与职工运动委员会等机构。其中政治委员会由苏兆征等13人组成。职工运动委员会由苏兆征等9人组成。会上，苏兆征与其他代表一起，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训，讨论了当前日益紧张的形势和党的斗争任务，并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苏兆征等2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苏兆征还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大会以后，相继建立和健全了党中央的一些机构。在武汉国民政府中也设置了党团干事会，由谭平山、苏兆征、林祖涵、杨匏安、吴玉章等五人组成。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成立了党团干事会，由李立三、苏兆征和林育南三人组成。此时，苏兆征已成长为党中央的重要成员之一了。

1927年4月间，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制造了反革命叛变事件。随后，湖北地区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越来越嚣张。但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却继续顽固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汪精卫集团日益严重的叛变活动视而不见，相反竟还主张放弃革命武装，压制工农运动，对反动派实行全面退让。一批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实践的共产党人如蔡和森、毛泽东、张太雷等，坚定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其进行了多次批评斗争。苏兆征亦根据自己的斗争实践经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行抵制。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可能发生，苏兆征与党中央有关人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积极

着手进行各种应变工作，对付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阴谋活动。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叛卖革命行径，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决领导中国人民将革命坚持下去。苏兆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当即与谭平山联名发表了一份（对武汉国民政府）《辞职书》，严斥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叛变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终于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公开叛变了革命；同时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让一人漏网”的大屠杀政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苏兆征与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一道，勇往直前，继续进行英勇的战斗。他及时机智地转入了地下，坚定地组织武汉地区工人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斗争。武汉地区工人奋不顾身地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在苏兆征主持下，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反抗压迫工人工会的宣言》，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无耻行径及其残酷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号召工人群众“勇敢向前，在秘密中更加严密的组织，赶快团结起来”，坚持革命斗争，向反动派进攻！

## 二

为了挽救革命和挽救党，在汪精卫集团公开实行反革命叛变的前几天，即1927年7月12日左右，中共中央于武汉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毅然决定排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改组党中央，成立了由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和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临时中央常委会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迅速筹备召开党中央的紧急会议等项决定。

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的一批领导人先后离开武汉，奔赴九江、南昌，积极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南昌具体主持领导起义事宜。遵照党中央的部署，苏兆征也离开了武汉，秘密前往九江一带，发动工人群众积极配合南昌起义的举行。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革命军队2万余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成功后，成立了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昌起义前夕，苏兆征临时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兼程赶回武汉，参加计划于8月上旬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的有关筹备工作，因而没有直接参加这次武装起义。但在他亲自组织发动下的九江工人联合二万余起义的军队，“举行了暴动”。南昌起义胜利后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苏兆征等25人，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

苏兆征从九江赶返武汉后，立即紧张地投入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为了总结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国内同志的要求而召开的。当时武汉地区已

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情况十分险恶。苏兆征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得到了革命群众的掩护，出生入死，大无畏地在武汉进行会议筹备工作。

中央紧急会议原是准备于7月28日举行的，由瞿秋白、张太雷与李维汉等人负责进行筹备工作。但因当时武汉形势万分险恶，交通十分困难，无法一一通知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不少外地代表也无法抵达武汉，因而会议无法如期召开。中央常委会乃积极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前来开会。8月3日，中央常委会先行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林育南等人参加，研究讨论有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等问题。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维汉和苏兆征等都在会上先后发表了意见，认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

乃是中国革命的新转机，应该予以接受，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中国共产党新的战斗策略；认为过去党中央的政策确实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中央政治局应该改组，新的常委会应当加入工人成份的领导人，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家长式的领导作风，等等。会上经讨论研究，确定了紧急会议的主要议程，通过了会议有关文件决议草案。苏兆征具体分工负责起草会议的部分文件，“‘八七’会议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便是他（苏兆征）起草的”。可是，由于当时时局非常紧张，交通十分困难，不但北方、上海和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然经过召集但仍不能到会；直到8月7日前，出席会议的代表仍然无法到齐，到会的中央委员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以及尚未赴上海工作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在此情况下，中央常委只好决定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sup>①</sup>。”

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于汉口原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举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群；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人亦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出席人数虽不多，但因当时环境万分险恶，中央内部交通足足花了三天工夫，设法将代表们一个一个带进会场；会后又一一设法送出去。这样一来，一进一出，前后就花了六天时间。

这次会议除了总结党中央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外，还要制定党的新路线，确定党在今后的工作方针等，因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



油画《八七会议》

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期间由李维汉担任主席，主持会议的进行。会议共有三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以及对报告和《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讨论；中央常委代表关于党的今后方针的报告，以及对报告和三个决议草案（农民斗争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党的组织问题）的讨论；改组中央政治局。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形势十分紧张，会议只举行一天时间。首先由罗明纳兹代表共产国际做报告，论述了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中共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等。接着再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简称《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发言和讨论。到会代表联系罗明纳兹的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代表们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其对于党的革命事业所带来的危害性；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这一问题，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苏兆征亦在会上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代表们所发表的正确主张。邓中夏对苏兆征这个期间的表现评述说：“如果苏兆征在武汉



苏兆征故居

时代已不期然而然有违反机会主义路线的行动；那末，此时更是反机会主义的急先锋了。”<sup>②</sup>

经过热烈讨论，会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通过了《告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等文件；并一致同意委托瞿秋白、李维汉和苏兆征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对《告党员书》等文件作出文字上的最后修改，然后向全党发布。李维汉后来回忆说：“这个《告党员书》是由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并由瞿秋白同志在8月6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在会上，瞿秋白同志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并决定以瞿秋白，我（即李维汉）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sup>③</sup>

会议第三项议程，即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初时提议临时政治局可由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五人组成。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接着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按得票多少排列顺序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人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七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至此宣告闭幕。

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举

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中央常委人选及工作分工等问题。经过讨论，通过由瞿秋白、李维汉和苏兆征三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在中央常委之下，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及出版局、交通局等机构。三名常委之间亦作了分工，由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等；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后为罗章龙）。此外，还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军事部；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负责妇女部，等等。8月15日，中央还通过了中央工委委员名单，由苏兆征、李震瀛、李涤生等五人组成。

“八七”会议的召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正如李维汉所说的：“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不开这个紧急会议，就不能纠正我们党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就不能确定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不能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sup>④</sup>作为“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者之一的苏兆征，与其他与会代表一起，对于会议的召开及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三

“八七”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立即着手恢复和健全中央领导机构及其办事部门，迅速开展工作，以保证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贯彻，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转变。考虑到上海地方革命力量比武汉强，也比较容易隐蔽，更有利于开展工作、领导全党斗争的进行，党中央经过研究，准备将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

9月23日，中央常委会召开了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等人参加的会议，具体讨论并正式作出中央机关从武汉迁移到上海的决定。会后，苏兆征、瞿秋白和李维汉等相继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在此期间，苏兆征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来奔走于上海武汉之间，艰苦卓绝地领导各地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继续坚持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活动。邓中夏高度评价说：“兆征同志从八七会议后，便成为中国党的中心首领之一了。”<sup>⑤</sup>

为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精神，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又决定在广东地区举行武装起义。10月间，中央常委会曾考虑：如果举行广州起义并取得成功时，应及时成立革命政权，并应在革命政府中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为原则”，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应选进仲甫、兆征、恩来等主要干部”<sup>⑥</sup>。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认为广东形势已形成了对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并委托苏兆征负责主持广州起义计划的制订等事宜。苏兆征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一起，具体研究和制定了关于举行广州起义的计划，送党中央审查批准。11月17日，中央常委会开会，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等草拟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会后，苏兆征恨不得与

## 如何改造“解放战士”

解放战争时期，让一个国民党军俘虏掉转枪口为解放军作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融化改造他们，解放军政治部专门研究了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新战士到连队后，连里首先组织诉苦会，老战士上去诉说自己受地主压迫的经历。许多新战士也是被抓壮丁来的，这些很容易勾起他们心底的伤痛，初步明了解放军是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老战士与新战士朝夕相处，生活、行军、战斗都在一起，随时随地都可以谈心，交流思想。班长宿营时帮新战士烧洗脚水、铺稻草，行军时帮他们背东西。有个新战士本来要找机会逃跑，正巧当

天生病，全班同志轮流照顾，送饭送水，使他感动得坦白了错误。

生活上关心照顾，政治上启发觉悟，拉近了“解放战士”与老战士的感情。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信任和平等的待遇。解放军中，无论新老战士，只要在战斗中表现勇敢，都可以立功受奖。“解放战士”中许多是技术兵种，上级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使用，使他们心情舒畅，感觉自己 and 老战士没有什么不同。很快，他们就融入了解放军这个新的集体，转化成为有革命觉悟的战士。

（作者刘统，摘自《党史信息报》第1057期）

张太雷一起，立即赶回广东，与战友们一道直接组织指挥广州起义的进行。但因工作需要，党中央临时决定苏兆征赶赴湖北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等人领导下，5000余名革命军人和工人群众胜利地举行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城，随即宣告成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虽然当时苏兆征没有亲自参加指挥广州起义，但由于他在广东广大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因而被推举为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席；在他到任之前，则由张太雷代理。邓中夏曾论述苏兆征在广州起义中的领导作用说：“东方第一个苏维埃，1927年12月11日在广州实现了。苏兆征同志便是这个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兆征虽未亲自指挥广州起义，但中央指导广州起义的总计划与训令，他是最积极讨论的。因此兆征同志实际上是广州公认的主要指导者之一，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创始者之一。”<sup>①</sup>

年底，苏兆征离开湖北，返回上海党中央，继续领导中央工委和全国总工会等工作。在上海环境极端险恶困难的情况下，苏兆征毫不畏惧，经常沉着机智地闯过敌人设置的重重陷阱，摆脱特务的密踪盯梢，沉着机智地开展工作。为了便于进行地下工作，党中央特意将苏兆征的妻子钟荣胜与儿女从广东接到上海，在上海福煦路（现金陵西路）马吉里地方租了一间房屋居住，以作掩护。当时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邓颖超等党的领导干部，时常到苏兆征家里开会研究有关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表面上却装成搓麻将或饮酒作乐的样子。这时候，苏兆征的妻子钟荣胜便拉着孩子坐在门口附近，望风放哨。

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委托苏兆征负责领导中央财务小组的工作。苏兆征深知党的经费得来不易，而这些经费使用是否得当，对于党的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又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十分重视并认真对待这一工作，注意关怀爱护在中央财务小组工作的同志，启发教育他们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并耐心帮助他们解决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

尽管当时环境十分险恶，条件十分困难，苏兆征在领导全国总工

会的工作同时，还继续致力于国际职工运动的工作。在他的努力和细心安排下，1928年2月4日至6日，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美国、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工会代表，克服重重困难险阻赶来参加。会议由苏兆征主持。他与各国工会代表一起，共同交流了一年来各国工人运动的进行情况及斗争经验。他还代表中国工会代表团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各国工会代表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以及苏兆征在带领工人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所作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这样，苏兆征在上海工作期间，面对严重白色恐怖和异常险恶的境况，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出生入死，临危不惧，积极想方设法开展工作，努力完成任务，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28年2月间，苏兆征离开了上海，前往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继续留在苏联，参加筹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工作活动。

### 注释：

①③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4、167页。

②⑤⑦《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9、399、400页；。

⑥《中共中央常委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载《广州起义》第5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